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

太平天国

【九】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

太平天国

【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外人记载（一）

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

范德一 许培德 夏春涛译

夏春涛校

凡例

一、“外人记载”部分共翻译、辑录了两种资料，即《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和《英国议会文书·中国》(*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 China*)。

《报道》一书由克拉克(Prescott Clarke)与格利戈里(J. S. Gregory)合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2年出版。本书将之全译编入，个别文献还补译了被原编者删略的一些重要段落。

《文书》一书由奥麦拉(J. J. O'Meara)等人合编，爱尔兰大学出版社(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1972年出版，计42卷。本书系选译，今题为“英国议会文书中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共分四个部分：

1.《关于中国内战的文书，1852~1853年》，选自第32卷《太平天国叛乱》(*Taiping Rebellion*)，标题为《南京的沦陷：关于中国内战的文书，1852~1853年[1667]LXIX》(*Fall of Nanking: Papers respecting the civil war in China, 1852~1853[1667]LXIX*)。

2.《关于上海外国租界遭受攻击的文书，1854年》，选自第1卷《国内的骚乱》(*Civil Disorder*)，标题为《在上海的攻击：关于上海外国租界遭受攻击的往来信函，1854年[1792]LXXII》(*Attacks at Shanghai: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ttack on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 1854[1792]*)。

3.《关于中国事务的文书，1859~1860年》，选自第34卷《天津条约》(*Treaty of Tientsin*)，标题为《条约的核准：1859年10月至1861年1月间关于中国事务的往来信函，1862[2754]LXVI》(*Treaty Ratificatio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 from October 1859 to January 1861, 1861[2754]LXVI*)。

4.《关于中国叛乱与扬子江贸易的文书,1862年》,选自第32卷《太平天国叛乱》,标题为《叛乱的进展:关于中国叛乱与扬子江贸易的文书,1862年[2976]LXIII》(*Progress of Rebellion: Papers respecting the rebellion in China and tread in the Yangtze river, 1862 [2976] LXI-II*)。

原书中文献的标题除个别因意思不甚明了而酌情改拟外,其余均照原文翻译。目录中各文献的内容提要由译、校者所加。

上述两书中原有不少插图,本书除择收一幅外,其余一概未收。

二、凡上述两书中相互重叠的内容,按删除《文书》、保全《报道》一书完整的方法处理,注明“见《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第××号文献”。

三、凡外国人名以及军舰、报刊等专有名称首次出现时,一律在括号内附注其西文名称,以便读者查核。

四、西文文献中原有的文字用()表示,原编者所加的文字用〈 〉表示,译者所加的订正或补充文字用[]表示。译文注释一律采用脚注,各文献原有的注释标明“原注”,该书原编者所加的注释标明“原编者注”,译者所加的注释标明“译者注”。

目 录

绪言 / 1

文献概览 / 7

一、初期 1850~1854年 / 19

第一部分 最初的报道(1850~1853年) / 20

1. 密迪乐的报告 / 22

2. 《中国丛报》的报道 / 23

3. 《中国丛报》的报道 / 23

4. 《中国陆上之友》的报道 / 24

5. 密迪乐的报告 / 25

6. 《中国丛报》的报道 / 26

7. 密迪乐的报告 / 28

8. 《中国陆上之友》的报道 / 29

9. 巴夏礼的报告 / 30

10. 《中国陆上之友》的报道 / 31

11. 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牧师的一封信 / 32

12.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田嘉璧博士的一封信 / 35

13. 《北华捷报》的报道 / 38

14. 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里佐拉蒂的一封信 / 41

15. 麦华陀的备忘录 / 44

16. 《北华捷报》的报道 / 46

17. 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赵方济的一封信 / 47

第二部分 最初的接触(1853年) / 50

18. 文翰爵士的报告 / 52

19. 密迪乐的报告 / 57
 20. 《北华捷报》的报道 / 62
 21. 费熙邦舰长的叙述 / 65
 22. 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沃德勒的数则日记 / 70
 23. 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戴作士医生的叙述 / 71
 24. 美国长老会哈巴安德牧师的一封信 / 82
 25. “何默士”号大副威廉斯的日记 / 87
 26. 里佐拉蒂主教的一封信 / 90
 27. 麦都思牧师的一封信 / 92
 28. 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一份报告的结论 / 95
 29.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葛必达神父的一封信 / 96
- 第三部分 最早的著作(1853~1854年) / 119**
30. 加勒利和伊凡关于太平天国叛乱初期历史的叙述 / 119
 31. 韩山文关于洪秀全早年生涯的叙述 / 123
- 二、中期 1854~1859年 / 130**
- 第一部分 西方更为密切的观察(1854年) / 130**
32. 美国驻华公使麦莲的报告 / 132
 33. 克陞存牧师的一封信 / 137
 34. 裨治文牧师的一封信 / 145
 35. 麦华陀和莱文·包令的报道 / 151
 36. 莱文·包令的叙述 / 160
- 第二部分 接触中断(1855~1858年) / 165**
37. 耶稣会葛必达神父的一封信 / 166
 38. 当尼库尔主教的一封信 / 170
 39. 威妥玛的一份时局报告 / 171
 40. 李泰国的一封信 / 172
 41. “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 173
 42. 当尼库尔主教的一封信 / 191

43. 麦利牧师的一封信	/ 194
44. 威妥玛的一份情况报告	/ 195
第三部分 恢复接触(1858~1859年)	/ 197
45. 额尔金勋爵的报告	/ 198
46. 威妥玛的报道	/ 205
47. 伟烈亚力牧师的报道	/ 209
48. 伟烈亚力牧师的报道	/ 210
三、晚期 1860~1864年	/ 214
第一部分 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密切接触(1860~1861年)	/ 215
49. 花兰芷牧师的一封信	/ 216
50. 杨笃信牧师的一封信	/ 221
51. 包尔腾牧师的一封信	/ 226
52. 艾约瑟牧师的报道	/ 230
53. 花兰芷牧师的一封信	/ 236
54. 梅德尔神父的一封信	/ 240
55. 罗孝全牧师的一封信	/ 242
56. 罗孝全牧师的一封信	/ 244
57. 慕维廉牧师的一封信	/ 244
58. 罗孝全牧师的一封信	/ 251
59. 杨笃信牧师的小册子	/ 254
第二部分 传教士们的退出(1861~1862年)	/ 269
60. 霍尔牧师的一封信	/ 269
61. 艾约瑟牧师访问南京的叙述	/ 271
62. 施约瑟牧师的一封信	/ 284
63. 杨笃信牧师的一封信	/ 285
64. 霍布森牧师的一封信	/ 287
65. 林乐知牧师的一封信	/ 288
66. 杜森牧师的一封信	/ 291

67. 麦嘉缔医生的一封信 / 292

68. 郭修理牧师的日记 / 297

69. 罗孝全牧师的一封信 / 304

第三部分 其他的密切接触(1861~1862年) / 306

70. 巴夏礼的报告 / 308

71. 白拉克斯顿上尉的报道 / 314

72. 亚历山大·米切的一封信 / 318

73. 吴士礼中校的叙述 / 321

74. 巴夏礼的报告 / 335

75. 富礼赐的报告 / 341

76. 约翰·赫德的日记 / 345

77. 富礼赐的报告 / 349

78. 富礼赐的天京见闻 / 350

79. 宁波和上海两地间的旅行日记 / 374

第四部分 在宁波的冲突(1861~1862年) / 379

80. 阿查立爵士的备忘录 / 381

81. 有雅芝的报告 / 384

82. 英国领事夏福礼的一件公函 / 387

83. 陆赐牧师的一封信 / 390

84. 格林船长的报道 / 395

85. 郭修理牧师的日记 / 397

86. 夏福礼的报告 / 405

第五部分 雇佣军的经历(1861~1864年) / 413

87. 富礼赐的报告 / 414

88. 李斯特中尉的几封信 / 416

89. 白齐文的一封信 / 420

90. 史密斯致《中国之友》信稿 / 420

91. 史密斯在苏州的日记 / 422

92. 纳里斯的声明 / 430

93. 唛喇的观察 / 435

四、余波 / 442

94. 道格拉斯牧师的一封信 / 442

95. 慕维廉牧师的一封信 / 443

96. 富礼赐的评论 / 445

97. 李希霍芬男爵的两封信 / 445

绪 言

无论把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叛乱”还是“革命”，它长期以来一直都被看成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的那段历史中，太平天国运动也许比其他任何一个事件都更受当代历史学家们的关注，研究这一运动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事件的学术著作不断问世。凡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都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涉猎太平天国史。

这一运动既是如此重要，自然会诱发人们对它的性质和意义作出种种不同的阐释。太平天国运动究竟仅是传统中国改朝换代范畴内的又一场叛乱（尽管其规模超过其他绝大多数叛乱），还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旨在打断这种历史循环，按照一种新的模式重建中国的社会和制度？除此之外，严肃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们还就其他许多问题展开了争论：它是否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使太平天国在中期元气大伤的那场内讧是否是对立阶级之间利害冲突的反映？是否它自始至终根本就是一场“千禧年”式的宗教运动，抑或就像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那样，它曾经制定了一整套能使中国沿着“理性”和现代化的道路变革的政治、经济纲领？最终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决定性力量和因素究竟是什么？它的失败是否严重延缓了能独立地屹立于20世纪的世界、富有民族自觉意识而又统一的新中国的诞生？它是否的确是“儒教中国终结的开端”和近代中国革命的起点？这些就是今人关于这场运动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结论难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不管对这些问题作出怎样的回答，所有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同太平天国运动的规模及其不容置疑的重要性相比，可供利用的原始资料少得可怜。简又文曾经写道，同他在50年前从事该研究时可用资料的贫乏状况相比，现今历史学家所

拥有的资料要丰富得多。尽管此说或可成立,但是,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大概仍会“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能利用的资料(举个大体上可供比较的例子)投以嫉妒的目光”。^① 诚然,在中国历史上的民众大起义中,几乎仅有太平天国留下了大量由他们自己撰刊的文献。但是,随着对这一运动研究的深入,历史学家发现其中的许多问题和事件扑朔迷离,难以考订。因此,他必须大大依赖于所谓的第二层次的原始资料,即那些写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但并非源于太平天国本身的资料。例如,1952年在上海出版的8本太平天国史料集共有3405页,其中仅有900页为第一手的太平天国文献,其余则是清方或其他渠道对该运动的有关报道。^② 梅谷(Franz Michael)编辑、1971年出版的两卷本太平天国文献集试图将当时所能获见的太平天国文献收集完备,用编者自己的话说,意在提供“太平天国的遗留文献,即研究太平天国叛乱所必备的基本原始资料”。^③ 它共有391篇文件,英译文约1600页。虽然现在可以对这部两卷本文献集补充若干“第一手”的太平天国文件,但它确已包括了可供利用的太平天国原始文献的主要部分。除非像发现敦煌古卷或死海卷宗^④那样发掘出一些新的资料,否则,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学家仍必须继续大量地依赖于源自太平天国以外而不是其本身的史料,尽管这远非他们所愿。

① 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21页;柯文南(C. A. Curwen):《太平天国叛乱者:李秀成供词》(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13页。——原编者注

② 向达等编:《太平天国》(上海,1952年),计8册,3405页;《亚洲研究杂志》,第18卷,67~76页刊有书评。——原编者注

③ 梅谷:《太平天国叛乱:历史和文献》(西雅图和伦敦,1966、1971年),第2卷,7页;该书9页也表示:“为历史学家提供可资利用的英文本太平天国遗留文献一直是我们的目标。”——原编者注

④ 指20世纪40年代在死海北岸岩洞中发现的具有考古价值的2000年前希伯来文经文。——译者注

这就是我们编选以下各篇西方报道的一个理由。显然,这些报道不同于梅谷一书所收入的那些基本史料。它们均出自太平天国局外人的笔下,这些人当然不是照相机,在记述所见到的一切时难免会带有主观情感色彩。但是,倘若对他们的偏见、希冀和先入为主之见稍加体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西方人大多能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亲身经历来进行报道,而这绝非太平天国圈子之外的中国观察家们所能相比的。此外,他们能凭借一种相对特殊的有利地位来从事观察和记述,这些报道尽管在某些方面带有局限性,但毕竟就太平天国史事提出了许多疑问,记录了大量细节,这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中文记载的不足,对历史学家而言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价值。因此,就更加充分地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重要运动来说,研究这些西方报道会大有帮助。

当然,和中文资料的情形类似,并非太平天国生活和历史的各个方面在西文资料中都有着完整的陈述。该运动的宗教和政治方面尤为西方观察家们所关注,前者自然见于传教士们的记载,后者则主要见于驻华外交官的记载。然而,大多数人除自身倍感兴趣的范畴外,还倾向于就其他领域发表评论,对这场运动的经济和社会方面常有论述,虽然仅是附带提及。因此,尽管每一个观察者都各有其局限和偏见,但所有这些西方报道汇总在一起,便提供了范围相当广泛的重要信息,虽然这些信息中经常夹杂着大量的评论和判断。在某种意义上,编入本书的文献既揭示了19世纪中叶西方对中国的设想和希望,同时又披露了太平天国的史实;读者至少可以从以上两个层次来阅读本书。

在选编这些文献时,我们的首要宗旨是收录目击者根据对太平天国控制区的实际采访而写出的第一手报道。不过,在该运动历史上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尤其是在1853年以前和1854年后期到1858年后期期间,西方人与太平天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为了使本书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扼要展示出西方对这一运动全过程的反应,我们收入了有关这些年份的一些二手报道,诸如中国沿海口岸

的报刊杂志、英国领事馆官员的情报性报告、身处中国内地的传教士的报道,以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尽管如此,本书所收的绝大多数文献仍然是直接报道,它们均按作者与太平天国接触的时间顺序编次,而不是按照其作品发表的实际时间,尽管这两者通常密切相关。卷首的“文献概览”逐一交待了各篇文献的作者和写作日期,其出处和发表日期则在每篇文献的标题处加以说明。

这一时期的西方人写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的报道,其数量估计不少于同时期中国人的著述。其时,正值报道世界各地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西方已成为一种重要行业的时代(《泰晤士报》曾派出“本报”特派记者赴华报道 1856 至 1858 年间的中英战争),各印刷出版机构(教会方面也毫不逊色)连篇累牍地刊发各种报道、评论和观感,将世界动态详尽地通报给读者,并加以引导。作为在世界上一个重要地区所发生的大叛乱,太平天国运动必然会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和关注,当然,这更主要的是因为这场运动带有基督教色彩。虽然大多数表示关注并诉诸笔墨的人离事件发生地相去甚远,但内有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根据对太平天国的实际观察和亲身经历而写成。这种观察往往流于粗疏和仓促,不过,有些西方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耳濡目染了许多事情,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写下了其见闻,并逐渐探究起这场运动。于是,以零散形式面世的各种文献,诸如写给政府或教会总部的报告,个人记事和日记,致友人、上司或报社的信函,小册子和书籍,便构成这一时期西方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为数可观的著述,而且它们并非仅是些随感或第二三手的报道。将所有甚或大部分文献收集齐备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一本书也难以容纳得下,因此,我们只能辑录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们相信,本书所收文献已囊括了几乎所

有西方人士往访太平天国的重要报道。^①

我们力图使所收文献能尽可能广泛地代表各种类型的西方观察者。最常见的当然是领事馆官员和传教士,但也包括了商人、雇佣兵,以及为数极少、身份特殊的旅行者、探险家和地理学者。必须承认,本书所选的绝大多数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有一篇最长的文献(全文收入)出自1853年访问南京的一位法国传教士的笔下。然而,事实上,真正到太平天国境内访问过的西方人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美国人,而后者几乎都是传教士。法国人与太平天国有过一些直接接触,本书收入了约10篇文献。但是,查阅法国外交部档案的结果表明,其中所含的相关资料微乎其微,根本无法与英国人所撰刊的丰富的报道相比。在这段岁月中,西方数英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最为频繁。

我们尽可能地让文献本身来说话,将评语和脚注压缩到最低限度。拼写法悉按原件,这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人名和专有名词的罗马字拼音。将相应的罗马字拼音转换成现代的威妥玛—贾尔斯式拼写法或汉语拼音并非易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晓此道的读者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们没有在中国人名或专有名词出现处用括号注明其威氏拼法或汉语拼音,以免打断原文的叙述,而是采用了一种似乎最为妥当的方法,在书末将它们单列一份对照表。本书另附有三幅地图^②,读者若想查阅更为详细的地图,可参看梅谷和简又文的权威著作。^③

如前所述,编这本选集的本意是将它作为梅谷所编太平天国基

① 有一部由目击者撰写的记载详实、分析透彻的著作本书未予收录,即密迪乐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伦敦,1856年)。由于该书为太平天国史研究者所熟知,且其重印本易于寻觅,故本书仅辑录了密迪乐的其他一些相关著述。——原编者注

② 原书所附三幅地图参考价值不大,故未收入。——译者注

③ 见梅谷前引书第1卷附录1和简又文前引书565~574页。——原编者注

本文献的补充。后者仍不失为这本呈献给严肃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的选集的坚实基础。将这两种文献集结合起来使用,便可以占有源自太平天国和西方的蔚为可观的原始资料,从中分析和评价这场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运动。

文献概览

一、初期 1850 ~ 1854 年

第一部分 最初的报道(1850 ~ 1853 年)

1.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50年8月16日关于广西叛军或匪徒之现状的报告;摘自伦敦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档案》(*Foreign Office Correspondence PRO, London*)。

2.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又称《澳门月报》)1850年8月关于广州的惊恐日益加剧的报道。

3. 《中国丛报》1851年3月关于广西叛乱运动的力量日益加强的报道。

4. 《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1851年3月关于新“皇帝”[洪秀全]是明朝后裔并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报道。

5. 密迪乐1851年6月13日为叛乱运动的品行和性质进行辩解的报告;摘自伦敦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档案》。

6. 《中国丛报》1851年7月讨论叛乱运动之起源的一篇报道,文中援引了广西巡抚的一份奏折。

7. 密迪乐1851年9月25日关于叛乱运动中“奇异教义”的报告;摘自伦敦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档案》。

8. 《中国陆上之友》1852年1月30日关于清军企图收复永安城的报道,内收一份太平天国的安民告示。

9.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巴夏礼(Harry S. Parkes)1852年3月25日关于永安局势的报告;摘自伦敦公共档案馆《外交部档案》。

10. 《中国陆上之友》1852年5月24日刊“本报中国记者”关于太平军撤离永安的报道。